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及其世界性意义

□ 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一、时代及其话语表达的勘定： 历史与思想的双重变奏

“时代”之称谓，既因主题而立，又因主题而异。事实上，“时代”的主题是一个难以清晰辨识和准确把握的最大的哲学难题。尽管古今中西，人们基于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意义使用“时代”一词，而且对“时代”也做了理念、旨趣各不相同的描述和概括。进入到思想史视域中的“时代”，首先具有历史性意蕴。通常所谓“时代”，更多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使用的。“时代”之表征，人类也可以通过技术发明所带来工具的进步得以表达。“时代”还具有神学意义上的道德价值评判的意蕴。在文学家的笔触中，时代甚至具有性质与好坏之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关于“时代”的认知，具有浓厚的神学目的论和循环史观的意味。无疑，此一认识仅仅看到了事物发展之量的变化，忽视了质的飞跃，周而复始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中国古代循环史观的奠基者是《易经》。迈入 21 世纪，随着技术革命及其所带来的全球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等方面全面深刻的变革，“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成为人类的共识性表达；同时，人类社会也正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学者们所谓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全球化时代”；而从社会发展和价值观变迁的角度而言，更有所谓“物质主义时代”、消费主义时代和“后物质主义时代”等，不一而足，呼求哲学理论的新的理解与诠释。

二、共处于一体的逻辑：“公共性时代”的话语努力及其规范性价值深蕴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某一个主题词之所以成为“主语”，并被确定为时代主体性理念，以及时代精神等的显性内容，绝非偶然。其理由在于，“时代”之问与“时代”之思之困惑的背后，不仅是人类对于历史及其自身生存境况的反思自省的表

现，更是人类在更高的历史起点和文明阶段之普遍意义上文化主体性、价值自觉性与实践自主性的体现。就其实质而言，一方面，这是人类对于诸多艰深的生存难题和困境的一种理性层面的集体性的反思观照和审视批判；另一方面，人类生存的公共性理念实践及其内在逻辑的形成和确立更是如此。

人类的社会群聚性本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属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群体共意、共契性；而公共性的价值理念，一定是“共生”“共在”“共创”，以及“共享”的合作理性的团契性质态。在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以及哲学史的意义之上，虽然公共性的思想理论关切并非始于今日，但是有关公共性生存和实践的困惑，却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自古至今，人类理智所努力的一切，其实都是以公共性信念为坐标原点而得以展开，并努力向着这一目标前行的。甚至可以说，公共性信念划定了我们时代思想学术的应然性边界，统摄了人文思想学术的主旨。公共性话语的缺失，是当代人文与思想学术缺失主心骨、理路混乱和方向迷失的根本原因。

公共、公共性是哲学之思的根本性内容，决定着哲学的立场、品质和境界，所有漠视或者丧失公共性关切的哲学，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不是一种好的哲学。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呼唤、再造思想理论表达的公共性的时代，是整肃、重建“公共性话语”及其表达的时代。

公共、公共性是人类历史、制度、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底色。我们的时代，就历史、制度、实践、生存、生活，以及思想文化的总体性情势和氛围来看，其实并不缺失“公共性事实”“公共性实践”，但唯独缺失的是基于公共性理论、公共性文化和公共性价值的切实的共识和集体行动。在理论姿态、实践方略，以及话语实践和话语反思的立场上，我们当以严肃、严谨的知识论传统，认真对待正在成为人类生存和生活之显性实在的公共性问题，并结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做出具有时代高度的分析，从而切实提升中华民

族之公共性生存品质的境界。

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发展史上,作为“代表性”的公共领域,所致力于营造的是一种具体实践理性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公共领域之所以产生和存在,有一个独特的功能、使命和责任,且关键在于,它是孕育公众公共理性,生成普遍的公共批判精神的核心场域,能有效地调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基于不同需要的满足与否而可能的冲突。公共意识、公共信念和公共性行为的获得与发挥,确保了每一个公民获得与政治权力相抗衡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与智能革命的进程,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地球业已成为一个“村落”。人类置身此生存境域,世界的开放性、民族国家的共生性、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全球意识的普遍性、交往实践的主体际性等,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公共性时代”已经到来。公共性的时代呼唤公共性的文化、公共性的哲学。一方面,一种文化、一种哲学愈代表公共意志和公共理性,愈具有公共性的价值关怀,愈能承载公共精神、公共品格;另一方面,愈能彰显其生命力,愈能获得更大范围的价值共识,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就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在为不同民族国家所公用与共享的过程中,为人类发展带来公利与公益。21世纪的世界,是人类思想文化之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性自觉”(觉醒)的时代,国际社会和知识界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公共性的理念和范式开启了一场新的人文学术新历程。

公共性的文化、哲学和价值理性之思,有着非常直接的现实理论关切,指向一种对于人类文明新转型时代之新的思想理论和生存范式的自主建构。客观地讲,这样一种努力其实伴随着人类生存与生活史的全过程。从现实看,公共性文化与价值导向的思想学术努力,正在依照自己的方式,日益积累为一种顽强的、巨大的推动与变革的力量,正汇聚起一股洪流,强力矫正着人类生存的价值坐标,实际改变着现今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制度明显悖谬性的生存逻辑,在艰难地前行中引领人类文明。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指向： 人类福祉至上的实践公共性 生存智慧的中国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无疑是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现实生存境遇的实践考量与价值关切,对于可预期的未来发展愿景的一种超前性谋划。作为一种人类学事实,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产物,共同体具有一种人学价值论层面的确定性的意义,甚或可以说,共同体的产生、存在本身,从一开始就具有或者指向某种确定性的意义追求。不论是处于何种存在境地,还是常识的定见,都在于认

定无论采取何种形态、无论进化到何种水平,现代社会、现代人所指称的“共同体”,一直居于人类有关对象性存在和自我存在的一种价值理性层面的观照和期许。人类之所以大费周章,对何谓共同体、共同体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回归真正的共同体等,长期以来进行苦苦地求索与论证,无一例外都是出于理智上的诸多困惑而已。尽管现代人身处其中的生存情景如此残酷,但是共同体却从来没有选择主动逃离或隐身,而是始终秉持伦理正当性信念,对诸如合作、仁爱、平等、共享等人类基本的公共价值顽强坚守与捍卫。共同体的守护者深知,人类之为人类、社会之为社会、文明之为文明、人性之为人性等,这样一些在复杂、漫长、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得以自主确立,并且为不同民族、国家世代所认可的,具有某种程度的恒定性的入道性真理,其实就是特定共同体得以建构和存在的基本理据,就是共同体之具有“意义”的关键之所在。这表明,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就在于其自身就是一个意义的集成体,共同体的价值绝非外在赋予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一个“安定和谐、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美好新世界的智识性贡献的核心与实质,在于其始终坚持并坚定不移地践行公共价值引领的人类整体性生存福祉至上的信念,以增进全世界人民的长远的、共同的以及整体性利益为己任。从理论层面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上摈弃了启蒙现代性所确立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个体利益至上性信念,强调人类生存、活动、发展以及价值实现实践中“共生”“共在”以及“共享”的公共性本质,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人的“社会性”“实践性”本质提升为一种以“一体化生存”为新特质的“公共性存在”。而从现实情境着眼,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对当今世界整体性意义上人类日益公共化的生存与交往实践的有效回应。

由此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追求、公共性品质以及公共性境界的最为集中的表现,就在于其着眼的是全人类的高度,赋予了共同体以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的共同体、价值的共同体等多重内容于一体的新的时代性蕴涵,是当代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为解决全球问题所贡献的卓越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不仅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崇尚“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联互通”“互惠互利”“共建共享”等价值生存新准则,涉及现代全球治理理念和范式意义上多领域、多层面、多主体等的同时在场性,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是一个需要国际社会协同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宏大的系统的工程,任重而道远。

■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约15000字